

思想的芦苇

变味的能人

朱棣文的行头和巩俐的首饰

谁来监督监督者

流氓何以混入官场

男人，不能没有……

金钱是几能的

.....

朱铁志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热门社会话题

思想的芦苇

朱铁志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想的芦苇/朱铁志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8. 2
(热门社会话题)

ISBN 7-80120-210-4

I. 思… II. 朱… III. 社会问题-中国-随笔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4298 号

● **热门社会话题**

思想的芦苇

著 者/朱铁志

责任编辑/吕 莺

装帧设计/李志国

责任校对/秦 真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北京市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25 字数/154 千

版 次/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0 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28

ISBN 7-80120-210-4/G·88

北京朝阳区

西坝河东里

定 价: 9.60 元

目

录

老鼠的口味·····	(1)
“心理障碍”·····	(3)
生命的悖论·····	(4)
也说“睁了眼看”·····	(7)
靠×吃×·····	(9)
续陈建功说农民·····	(12)
足球内外·····	(13)
为马俊仁作注·····	(16)
“不懂事的大人”·····	(17)
生命的价值·····	(19)
杜伊斯堡之夜·····	(21)
公认名牌之类·····	(23)
在“革命”的名义下·····	(25)
守好“心头的岗哨”·····	(30)
无错不成书?·····	(32)
理性的黄昏?·····	(34)
变味的“能人”·····	(36)
一株会思想的芦苇·····	(38)
心灵的印痕·····	(40)
再说“变味的能人”·····	(41)
爸爸不是大灰狼·····	(43)

工作就是开会吃饭?	(45)
富人别骚扰穷人	(46)
发迹秘诀	(47)
学位	(50)
欣赏别人	(51)
非功利读书	(52)
补丁	(54)
狐狸的驳诘	(56)
足球与中国现实	(57)
举贤	(60)
从新闻做起	(61)
可悲的博士帽	(63)
朱棣文的行头和巩俐的首饰	(65)
文人的自恋	(66)
拷问灵魂	(67)
专业废话	(69)
精神的归宿	(71)
良心的贬值	(72)
说“会做人”	(74)
说“农民”	(76)
“面的”情结	(78)
女儿的权力观	(80)
“流氓”何以“混入官场”?	(82)
读报随笔	(84)
王海打假还有戏吗?	(86)
说“状态”	(89)
“代表”素质和百姓眼光	(91)
东北人	(92)

真假之间·····	(94)
牧惠老汉的绝活·····	(96)
假如我是亲人·····	(98)
“皇军帽”岂能当时髦! ·····	(99)
钱这玩意儿·····	(102)
男人, 不能没有·····	(105)
鲁迅·瞿秋白·杂文的使命·····	(107)
颠倒·····	(110)
《红粉》《红尘》及其它·····	(112)
寻找自我·····	(114)
归还童年·····	(115)
聂卫平的皮鞋与爱国教育·····	(118)
狗年文化论·····	(120)
谁来监督监督者? ·····	(121)
狗年闲话·····	(123)
嫉妒就是嫉妒·····	(125)
写在女儿的绒衣上·····	(127)
在吞云吐雾的背后·····	(129)
“子成龙”与“己成龙” ·····	(131)
“不敢回家” ·····	(132)
从《辛德勒的名单》说到	
文艺作品的不同属性·····	(136)
“让阳光照亮体制” ·····	(139)
寂寞人语·····	(141)
一种“病” ·····	(144)
生命的延伸·····	(145)
另一种“下笔如有绳” ·····	(147)
《较量》之外的较量 ·····	(149)

说“不健全”	(151)
说不清的北京人	(152)
金钱是“几”能的?	(156)
窝里捧	(157)
实况录像	(159)
忽然想到“引咎辞职”	(161)
“风雅”的甜头	(163)
编读四题	(164)
无悔的青春何所依	(169)
感谢孩子	(171)
艰难在征途	(172)
看不见的战线	(173)
本土“留学”散记	(175)
监督监督者	(178)
广而骗之	(179)
“失错”的勇气	(182)
克莱德曼后话	(183)
“减实”的代价	(185)
由一组照片想到的	(187)
“掌声”断想	(188)
话说“名誉××”	(190)
说人生的“意思”	(192)

老鼠的口味

似乎没有人考察过动物饮食与人类生活的内在联系。在我年幼的六十年代初期，曾有过这样的记忆：一次，居委会发放耗子药，每户分得一小包，是些黄红间杂的玉米粒和高粱米。凑近看时，能够隐约闻到一丝香味，妈妈说那是因为在鼠药里点了香油。记得我当时对老鼠羡慕得要命，恨不得抢吃那诱人的米粒。妈妈听到我的想法大惊失色，说可不敢乱来，不然要出人命的。我是咽着口水记住妈妈的话的。上小学以后，我曾把当时的想法告诉要好的同学，不想他大喜过望，说他也有过完全一样的想法。原来我的“秘密”也是不少人共有的秘密，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正因为有过这样的记忆，所以看了天津灭鼠的报道格外感慨系之。据《天津青年报》报道说，近期天津市开展大规模的灭鼠活动，全市投放了大量鼠药，可老鼠活动依然猖獗。有人怀疑鼠药失灵，经过认真观察发现，不是鼠药失灵，而是老鼠根本不吃。市爱委会的吴春秋同志说，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们的垃圾箱中，馒头、火腿肠太多了，老鼠吃都吃不过来，怎么会去吃掺药的玉米粒？和平环卫车队的于克新同志说，用汽车装运垃圾时，他时常好奇地扒开垃圾看看，有时发现一大半都是吃剩的东西，鸡、鸭、鱼、肉应有尽有。他曾往垃圾箱内撒过鼠药，老鼠理都不理。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然早已超越了艳羡鼠

药的程度。不要说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就是比我们更老的父辈们，大概也不会再从鼠药中闻出香味了吧？我的女儿听说我居然馋过鼠药，说你编故事也编得太笨了，谁信啊？我又说天津的老鼠不吃鼠药，她说那倒差不多，童话里早就说过了，城里老鼠比乡下老鼠吃得好。

老鼠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成正比，我不知道。从天津的情形看大抵是如此的。但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一定要导致奢侈浪费，一定要使老鼠的饮食水平也跟着水涨船高，却是我始料未及的。从全国范围看，天津算不上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下岗职工、待业人员还有相当人数，潜在困难不少；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算不上富国，每年还要进口大量的粮食以解决 12 亿人的吃饭问题。天津的老鼠未富先骄起来，广州的老鼠、上海的老鼠又要吃什么呢？大概非海鲜、猫肉不抬眼皮了吧？中国的老鼠如此，欧美的老鼠又要吃什么呢？恕我缺乏想象力，大概只有吃天国的美味了。然而时常从报上看到的消息也不免让人丧气，欧美虽然比我们富，但说到吃食，他们似乎比我们“抠门”得多。前两天看到一则报道，说瑞士居然有个葛朗台俱乐部，其成员以勤俭节约著称，每人服装最多不超过三套，家中电视多为过时的 14 寸黑白货，有人甚至根本没有电视，连发霉的面包加温以后也要再吃，其寒酸状大概不免让天津老鼠耻笑了。

老鼠口味的刁钻虽然让人感慨，但并不是不能改变的，只要人类加强自律，改掉奢侈浪费的臭毛病，区区耗子又能神气到哪里去？但生活中有一种硕鼠，其胃口之大、口味之刁，都不是轻而易举可以改变的。当年的“贿情”是拿着“20 响手榴弹”就能摆平一个局长，一万元就能要刘青山、张子善的小命，现在呢？你再拿几条烟、几瓶酒试试？非但不给你办事，就是已经办好的事情没准儿也给你砸了。为什么？天津老鼠的口味都已经变了，何况有身份、有地位的硕鼠？没个几十万、几百万，你不是打发叫花子么？

“心理障碍”

很多外来的好东西到了中国要变味儿，这是“中国特色”，也是鲁迅和柏杨都曾精辟论述过的，前者喻之为“染缸”效应，后者喻之为“酱缸”效应，其消极的同化作用，是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能够感受到的。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相应的，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等行业逐渐走近我们身边，这对“心病不是病”的传统观念当然是革命性的冲击。然而这样一个贴近时代、贴近百姓生活的好东西，正有被人利用、慢慢变味儿的危险。据有关方面披露，上海中小学生心理问题的检出率为12%—14%。照此推算，有心理问题的青少年当在10万之上。这一惊人的数字来自于一家医院附设的青少年心理咨询门诊，所抽样的学生是那些被父母领来或被老师劝来的所谓“顽皮”或“异常”的少男少女。

所谓“心理咨询”，通常由一个或几个穿白大褂的“心理医生”主持。走进这类门诊，大抵要“见物不见人”，严肃的医生并不对患者罗嗦，而是把“病人”引向电脑，让他门面对电脑回答各类事先设好的问题。然后很快由打印机打出诊断结果。一位熟悉这一行当的人士透露，搞心理门诊若没有电脑测试不仅会让人视为不正宗，而且也不容易提高收费标准。倘若不把问题说得严重些，恐怕不会再有“回头客”了。据某工读学校的调查，有80%以上的学生在原校时就被送去接受过心理咨询，不论愿意与否，有30%已被怀疑为心理不正常了。

拉杂的报道验证了我有限的见闻。在我熟悉的同学和朋友中，就有好几位的子女被要求去做心理检查。老师们在作这种动员和

劝导时，是带有很强的暗示性的。如果哪个同学被查出有“心理障碍”，某些老师并不痛心，相反，似乎还很有些兴奋的样子。因据说有些学校作了明确规定，“有心理障碍”的学生可以调整到特设的班级中去，而不至于影响原班级的升学率乃至教师的奖金。

我于心理学是外行，虽然说不太清这门严肃的学科究竟是干什么的，但我肯定知道它不是用于摧毁人的自信、亵渎人的尊严的。它的被恶意滥用，实在是它的不幸。

生活中当然不乏患有心理疾病的不幸者。但在我看来，起码90%以上的孩子心理是健康的。恰恰是某些成年人以不太正常的心态和眼光看孩子，才看出那么多所谓“心理障碍”！个别学校和老师可以据此摆脱教育的责任，少数医生可以据此大发不义之财，多一个“有障碍”的孩子，学校就少一分降低升学率的危险，老师的奖金就多一重保险系数，医生的腰包就多一分保证。前者设障于前，后者牟利于后，可怜那些成绩较差的孩子还有自己的出路么？

看来，患有“心理疾病”、具有“心理障碍”的的确不乏其人，但不是孩子，而恰恰是爱他们的父母、老师和学校，还有以治疗的名义致孩子于“心理障碍”的所谓医生。这个社会迫切需要治疗的不是孩子，而恰恰是包围在他们身边的大人们。与其事事“从娃娃抓起”，不如好好反省一下大人自己吧。

生命的悖论

音乐的美好与永恒，和音乐家生命的困苦与短促，是我在欣赏音乐时感慨不已的悖论。为什么创造人间至美的人常常要遭受困窘？为什么揭示生命本质的人往往要以生命为代价？上帝真的是公平的么？那他为什么总是让创造永恒的音乐家随风而逝？

莫扎特在音乐史上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作曲家，在其创作中出现了许多革新的因素。但他的创新不为当时墨守陈规的人所接受，因此经济压力很大，经常借债度日。他曾说过：“我的舌头已经尝到了死亡的滋味，我的创作还是乐观的。”他一生创作了75卷作品，留下了《费加罗的婚礼》、《唐璜》、《后宫诱逃》、《魔笛》等著名歌剧，但不到34岁就离开了人世。贝多芬一生创作了《英雄》、《田园》、《合唱》等九部不朽的交响曲以及《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在音乐史上永远镌刻上了自己的名字。然而他从26岁起就开始耳聋，晚年全聋，伟大的《第九交响曲》等一系列作品就是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歌曲之王舒伯特以高产著称，一生创作了14部歌剧、9部交响曲、一百多首合唱曲、567首艺术歌曲。但他生活清寒，赖别人救济而生活，年仅31岁就不幸夭折。钢琴大师肖邦一生创作了无数优美的钢琴作品，在音乐史上取得了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但其后半生流亡国外，过着困苦的生活，内心十分孤寂。他曾痛苦地自称是“远离祖国的波兰孤儿”，年仅39岁就溘然长逝了。一生创作大量传世之作的德国作曲家舒曼，由于长期疲劳，46岁也匆匆告别音乐，在波恩附近的精神病院撒手人寰。在不幸英年早逝的作曲家行列中，还有自学成才的美国歌曲作曲家福斯特（38岁）、法国作曲家比才（37岁）、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42岁）、美国作曲家格什温（39岁）、我国作曲家冼星海（40岁）和聂耳（23岁）等……

在五花八门的人群中，我始终认为，音乐家是活得最率性、最真实、最执著的人，同时也是活得最孤独、最痛苦的人。因为在与众多仅把自己的行当作为职业的芸芸众生相比，他们无疑是把音乐作为彻底的事业，作为全部生命进行观照的。有人也弄音乐，但他们只是把音乐作为谋生的手段而已，尽管无可厚非，但作为手段的音乐绝不可能是真正的好音乐。大师们就绝然不同了，他们在热爱音乐这点上，是把手段和目的高度统一了。不仅如此，他们非但没有把音乐作为谋生的手段，相反，已把生命作为获得音

乐的手段和条件。只要能为音乐这个目的服务，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在这点上，他们是极端的“功利主义者”，是彻底的音乐至上主义者。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矢志不移、死而无憾。

然而我们也能在天才的早逝中“无憾”么？世上大概很少有不喜爱优美音乐的人，但我们能把欣赏的愉悦建立在作曲家的早逝上么？古语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早逝的作曲家们不能说“出师未捷”，他们已经登临了人类音乐艺术的高峰，如若假以时日，他们必然进一步登上顶峰。他们是在看见珠穆朗玛的时候倒下的，这难道不让活着的人更加感慨唏嘘么？如果在美好的音乐与作曲家的生命中作一次残酷的选择，就算我们万分喜爱音乐，我们能说宁要音乐而牺牲作曲家么？

生命个体的可持续性发展，是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即使是为了美好的音乐，生命也不该仅仅被作为手段和工具，而更应成为目的本身。这样说，当然不是为了简单地散布萎琐的生命哲学，而是呼唤在更深的层面、更高的意义上尊重生命，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敬畏生命就是敬畏美好的人生，就是敬畏美好人生所承载的美好事业。

世事的逻辑有时真是悖谬得恼人，越是社会中的优秀分子，往往越是焚膏继晷、呕心沥血的人。他们不是不懂生命对于事业的重要，这些连我们都明白的常识难道人类的精英不懂么？但与他们心中辉煌而宏大的事业相比，时间实在太短促了，短促到使人无法与之邂逅便要匆匆告别的地步。他们不能在这痛苦的两难选择中作出抉择，便只能挥霍自己的生命，以成全至高无上的事业。他们奉献了最美的精神食粮，却永远地毁灭了自己的生命。让我们这些活着受益的人不免常常自问：人间至美的东西真的要以毁灭生命为代价么？问苍天，苍天默默无语；问大地，大地痛苦地摇头；如此深奥的问题我更是无能为力了。

也说“睁了眼看”

作家张贤亮的新作《小说中国》，是一本机敏睿智、饶有趣味的好书。在这本别具一格的著作中，作家评说世象，透视人心，提出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其中有关中外文化比较的部分。虽然作家谦虚地说自己“没有学问加入学术界有关东西方文化‘碰撞’的讨论”，但事实上他以作家特有的敏感，提出了很多富有见地的观点。比如说到东西方的相互了解时，作家判断道：“我观察的结果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知道欧美，比欧美老百姓知道中国不是略多一点，而是多得多。”“欧美报纸电影电视报导中国当前的新事物极少……有时有点中国新闻也是一惊一乍的，由记者个人的观点决定，或者较为客观，或者把中国‘妖魔化’，而它们研究中国的机构似乎仍没有什么长进。”

张先生的判断，与半个世纪前一个英国人的判断正好不谋而合。早在1928年，英国人韦尔斯就曾撰文，警告欧洲人说欧洲人之了解中国决不如中国人之了解欧洲。如此看来，时间过去了70年，情形并无大的改善，我们大可以在“了解的优势”面前得意一回。

然而且慢，事情的一面固然如此，另一面却未必尽然，我们如若在表象的“优势”面前沾沾自喜，那就未免太浅薄、太可笑了。近代以降，中国的大门以一种屈辱的方式打开，从那时起，中外文化的交流便畸形地展开了。这场较量从一开始，我们就输了第一回合。从那时起，西方列强以种种名义进入我华夏土地，有赤裸裸的侵略，也有假扮教士的“传道”。不管动机如何，却始终有意做着一件事情，那就是有计划、有目的、有系统地研究和了解中国，并且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后来的情形当

然不能简单与侵略同日而语，但出于或友好或利用的动机，这种研究和了解是不停顿地继续下去了。

事实上，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早于近代。16 世纪下叶，西班牙人门多萨就写出了西方第一部研究中国的学术著作《大中华帝国史》，七年内以七种欧洲主要语言出版了 46 版，可见当时的欧洲对中国就极感兴趣。此后不久，利马窦写了《中国文化史》一书，在这本书中，他第一次试图用自己文化体系的概念来解释属于全然不同的文化体系的另一种文化。18 世纪，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的政治制度，而伏尔泰的《世界史》就是把中国作为逻辑起点的。布朗杰的《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和亚当斯密的著作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原因。到了黑格尔，则把中国置于世界历史发展之外的“未入流”地位！到了 20 世纪，韦伯和斯宾格勒重新把中国研究推向新的高度。韦伯在《中国宗教——儒家和道家》中系统分析了中国社会的落后根源，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种种行状提出了引人思考的见解。斯宾格勒的《欧洲的衰落》一改黑格尔的偏见，重新把中国作为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研究，并且忠告：“如果中国不能像其他社会一样更新并重新确定自己文化的规范，中国人就会成为‘飘忽不定’、‘没有精神’、失却自身文明的一群人。”斯宾格勒的理论为 20 世纪后半叶中国研究的勃兴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如果大家不过分健忘，迄今为止还卓有影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也是英国人李约瑟先生撰写的，说来真是令我们惭愧。简略的回顾只是局限于学术文化领域，如果把西方在文学艺术领域对中国的关注也罗列进来，这篇小文就无力承受了。

反观几百年来我们对西方的研究又如何呢？恕我孤陋寡闻，实在乏善可陈。有人在 1928 年就指出：“中国留学生关于批评欧洲有系统的研究较为成器的著作，好像还未出世。”转眼 70 年过去了，情况究竟有多大改变呢？远的不说，单是对我们的近邻日本，研究得就十分不够，起码与日本对中国研究成果的汗牛充栋相比，

我们还差得很远。其研究水平，与几十年前周作人的散论和戴季陶的《日本论》也还差得不少。周、戴二人的道德品质和行迹如何是一个问题，他们对某一个国家的研究水平是另一个问题，大可不必因人费言，贻误自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派出了数以几十万计的留学生，他们睁了眼看世界，取得了一大批可喜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和这一代人因“文革”而造成的天然缺陷，使他们的研究很难真正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事实上，真正有见地、有价值的东西的确不多，这是不得不承认的。

就一般民众而言，张贤亮先生的判断可能是对的，我没去过欧美，无从判断张先生的判断是否正确。据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方大为先生说，普通西方人士对中国的了解未必比普通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更多，那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人自己宁愿相信的好话而已。在我看来，争论谁多谁少没有多大意义，决定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研究水平的，主要还是要看学者的著作。恰好在这方面，我们不敢盲目乐观。去了几趟欧美，走马观花看了一点西洋景，虽然不无感性认识，但与真正的研究毕竟还差得远。至于《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之类叹苦经类的作品，看看未尝不可，当真却不行。

我并非在外国人面前妄自菲薄，不过是想提醒同胞们在美妙的好话面前保持一份应有的清醒。因为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奉献我的感谢”，对于那些“故意称赞中国旧物的人”，“当永久的诅咒”。

靠 × 吃 ×

文中的×您看着填，根据个人不同的经验，一定会填出五花八门精彩绝伦的内容。通常的想法当然是传统的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但如今毁林事件时有发生，土地沙化日趋严重，江河污染已成不争的事实，这样的山水吃起来恐怕已远不如从前了。

那么往×里边填什么，就成了眼下十分迫切的问题。于是，聪明的先生女士们就上下求索，着力开发古今中外的各种资源。有权的靠权，有钱的靠钱，有人的靠人，有车的靠车，总之是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把政策和条件用足。开窍比较早的是一批见多识广的领导干部，先有河北巨鹿县农机局副局长李印忠，后有广东雷州水利局局长林全，继而又有浙江平阳县组织部董根顺。三位爷都弄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权利不是说着好玩儿的，而是有实在内容的。权与利不是两个汉字的简单组合，而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孪生兄弟。有权就有利，有利可获更大的权，这是明摆着的“辩证法”。怎样在权与利之间寻找一个有效的中间环节？三位爷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钱。你不是有钱没权么？我不是有点儿小权但特缺钱么？何不互通有无、各取所需？于是三位芝麻官人不分老幼，地不论南北，先后办起了“官位批发小卖部”。短短几个月工夫，都迅速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可见卖官一途不仅古已有之，而且于今依然有效，不然何以三五月便能闹个几十万元户呢？

与上述三位官人的稳妥相比，河南睢县蓼堤派出所副所长李彦杰的做法就有些铤而走险了。李某身为人民警察，却与妓女串通一气，先是怂恿妓女卖淫，再由妓女提供嫖客名单，然后由自己去向嫖客罚款。从1996年12月到1997年2月，短短3个月，也小得溜地闹了9000块。虽说不能和批发局长处长相比，但放线钓鱼，坐享其成，倒也潇洒自在。与此可以媲美的，还有陕西咸阳市工商局商标所副所长尚美英。此人利用职务之便，自写举报信151封，然后以此要挟企业，称不掏出150万元就将信发出去，让企业吃不了兜着走。要不是企业不胜其苦斗胆报警，尚副所长就美梦成真了。

还有靠领导吃领导的，拉旗作皮，狐假虎威，是最为常见的